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
黄 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 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 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裴敏欣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汤 敏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旭东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邀专家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曙明 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 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郭生祥 澳大利亚澳华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
海 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胡元豹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执行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 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 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罗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与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梅 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史天健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学院教授
隋殿志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校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唐永春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
王 坚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传播学院教授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 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力资源学院院长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 国 忠玫瑰石顾问公司独立经济学家。
谢 宇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真格基金会创始人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 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 壮 北大国际MBA院长
张 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赵红心 美国圣路易大学财经教授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执行主编

苗 绿 邓宗南

编辑

王志琴 兰春姮 邹 容

编务

赵映曦 吴雪宝

第三届海高会在京成功举办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海外高层次人才建言献策座谈会8月20、2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韩启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智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等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有关人员出席会议。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11个国家的52名海外代表出席会议。此次研讨会得到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大力协助。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作为参会代表，在会上谈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会上，韩启德阐述了留学人员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留学人员特别是海外留学人才在建言献策方面具有的优势，强调了海外留学人才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意义，并就建言献策向海外留学人才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李智勇在讲话中介绍了“千人计划”实施的情况，以及“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在提升国内科研水平、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人才机制创新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的贡献。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傅志寰询问了海外华人社团的人才技术交流现状，并表示要构建更多平台以加强与国内外技术人才的沟通。

会议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主议题进行探讨，并就“文化发展与民族复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国家未来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和“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与对外经济合作”四个分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社会学终身教授李捷理、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宏、欧洲航天局航天技术研究中心宇航系统资深高级工程师、荷兰华人学者工程师协会副主席吴树范等优秀海外代表作了精彩发言，给海内外参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海外代表就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发展等问题作了发言与讨论。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李捷理表示，21世纪海外华人为中国的发展腾飞作出了很大贡献，此次座谈会把海外华人集中到一起进行交流，这个平台的搭建意义十分重大。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宏在会上提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的“地中海”模式，将地方政府、中资企业机构和海外华人相结合，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各自的优势。此外，他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才政策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吸纳海外人才为国服务。

附部分海外参会代表名单

-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 陈迅勇 美国骑士资本董事总经理 美国华尔街人协会会长
- 范晓娟 美国马歇尔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终身教授）
- 郭杰群 美国 IDC 集团全球固定收益量化和策略部、结构金融证券评估部全球总监
- 郭生祥 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终身研究员
- 郭胜北 美国 GSB 奖台基金创始人和总裁
- 侯文轩 英国杜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副教授(终身教职)
- 黄 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 黄 伟 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
- 蒋 蔚 美国杜克大学神经心理心脏实验室主任、终身教授
- 库 超 美国 Two Sigma 投资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 李百炼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数学与理论生态学终身教授和 CAU - UCR 国际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李大西 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 CASB Ventures LLC 董事长
- 李捷理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俄亥俄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终身教授
- 李叶青 世界贸易与发展集团资深合伙人兼亚洲事务总裁
- 林 平 法国拉法基水泥公司工业管理与投资总监
-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 卢汉超 乔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 庞晓东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副主席
- 史文娟 汉堡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基金会会长，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艺术学院教授
- 索 索 美国西部信托、EIG 全球能源投资公司执行董事
- 汤 本 美国克莱蒙研究所董事、高级研究员
- 王 华 环球华人公共事务协会会长，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环境经济研究员
- 王 宣 意大利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常务理事
- 吴 秦 法国 HIPOTEL 酒店连锁集团董事总经理
- 吴树范 欧洲航天局航天技术研究中心宇航系统资深高级工程师，荷兰华人学者工程师协会副主席
- 伍晓鹰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教授
- 武 斌 英国中国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 谢鹏飞 EIM 管理 (美国)董事总经理, 高级合伙人
- 徐 鹰 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 颜海平 康奈尔大学 终身正教授
-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 裔锦生 美国华尔街重心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

尹 斌	中国留俄学生总会主席
尤伟顺	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中华海外人才网董事长
曾安平	汉堡科技大学正教授，生物过程与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过程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 宏	欧洲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会长
张 青	麦肯锡咨询公司 (纽约公司) 董事合伙人
张伯康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所常务主任
张风波	美国花旗银行纽约总部高级副总裁
张建伟	德国汉堡大学终生正教授、所长，中国留德学生学者团体联合会名誉主席
张康清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项目总监
张文献	美国罗林斯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晓明	美国波士顿 128 华人科技企业协会主席，美国系统分析公司总裁
张晓青	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主管合伙人
张旭东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主任，中国中心主任；
赵启光	美国卡尔顿学院讲座教授、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名誉院长，国际低碳战略研究院院长
朱孟文	中国留学生莫斯科留俄学生总会副主席兼艺术顾问

专题研究：

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与中国社会管理： 以解决中国乡镇社区环境矛盾为例

世界银行专门研究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的经济学家 王华

• 问题

我国过去 30 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的快速城市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如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住房拆迁和建筑工地的噪音灰尘污染，工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水气污染和生态破坏，城市化过程中的交通医疗教育和环境矛盾等。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如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难以及时设计、调整并解决不断涌现并且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

• 手段

基层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制度可以作为对我国现有社会管理手段的有益补充。在

基层，如乡镇社区街道，那些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地方，由某机构，如居委会或行业协会，在党的支持下，就当地老百姓、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所关心的某一问题，组织利益相关者，以圆桌会议形式，进行面对面直接对话，以加强沟通理解，并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圆桌对话会上，责任相关方（可以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群体和个人）往往被要求对问题的解决做出承诺和解释，并在下一次对话会上进行检验；矛盾相关方被要求一起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直到达成协议。媒体和社会志愿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对大多数问题的全部解决或部分解决，进行多次对话和协商往往是必要的；对某些特殊问题的解决，最后还得诉诸于法律或政府。

• 实践

2000年笔者在江苏、天津、贵州等地的9个乡镇探讨用乡镇企业污染控制报告会的办法促进乡镇企业的污染控制工作。这项报告会制度为圆桌对话制度的雏形，笔者在江苏环保领域不断试验，并在江苏省环保厅的推动下不断推广并逐步成熟，现在许多地方都加以应用。其中江苏省泰州市发展成一个全国典型的环境保护圆桌对话案例点。2005年和2006年笔者在重庆试验圆桌对话制度，从解决万盛区的城市垃圾问题开始，逐渐在万盛推广出完善的社区圆桌对话制度。到目前为止，万盛已开展了上百场社区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解决了用传统管理手段难以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问题。2006年至2007年笔者同国家环保部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合作，在推动全国绿色社区创建的活动中开展社区环境圆桌对话，现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已开展了环境圆桌对话活动。

在探讨建立基层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制度的过程中，一批基层干部包括居委会主任书记、行业协会民间机构领导，以及一些新闻媒体工作者，得到了培训和锻炼。一些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和探讨。

实践初步证明，基层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制度是可行、有效、灵活、操作成本低的社会管理制度。对那些看起来越复杂的问题，该制度越能显现出它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的推动，该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进展缓慢。

• 意义

基层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它可以不断地在基层帮助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它可以帮助改进政府、企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促进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制度的完善，实现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法律规定的民主人权，培养和提高社会参政议政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政府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促进社会稳定。而且由于对话在基层开展，即使问题最终不能彻底解决，也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

• 建议

建议选择若干市县，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在环保、医疗、教育、城建、交通、财政和劳资等领域，广泛进行基层利益相关者（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老百姓）圆桌对话制度的试点工作，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广。

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上的思考

——国际发展学视角

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 李捷理

引言

进入 21 世纪，国际发展学已逐渐从单维的经济学视角转变成多维的交叉学科视角，其研究范畴不仅仅着眼于工业化进程，而是更侧重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核心转向人的发展以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区能力发展。因此，国际发展学超越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扩展到人类发展、环境、性别、公共健康和社区心理学等多维领域。

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不同的是，人类发展学提倡多维研究，从多维平衡发展观点来研究发展，以人和社区能力开发来看发展，研究核心是人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与市场、环境和国家关系。因此，国际发展学逐渐转变为交叉学科研究，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环境科学、公共卫生学，甚至生物医学等学科。国际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发展，即视全球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创造一个能够发展其潜力，满足其需要和利益，享受富有成效的、创造性的生活环境。

发展的手段：能力构建的研究

国际发展学前沿研究的明显趋向是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中把发展只看成目的而非手段的局限，而将发展本身看成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强调人与社区能力的构建是发展可持续性的基础与保证。因此，这一过程的本身既是发展的手段，同时亦是发展的目的。综合近年来出版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在人和社区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可大致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研究：

1.1 微观方式

对人的个人能力发展方式的研究，即如何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扩展。扩展个人能力的关键是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拓展，包括发展权、参与权、平等权以及不受性别和贫穷歧视的权利等。研究表明，个人能力的扩展和潜力的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1.2 中观方式

对社区能力发展方式的研究。社区能力的强与弱是指社区内居住和活动的人群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当地资产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作出有效的回应。因此，对社区自身资产价值的认识，对社区人群潜能的挖掘，还有社区心理素质等因素，都会对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创造、把握和利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区能力构建模式能够调动居民积极性，促进有意义的改变，是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方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社区能力的开发和构建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追求平衡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3 . 宏观方式

对社会体制机构能力发展方式的研究。体制机构能力是指社会四大体制（社区、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是否保持良性互动，是否能相互维系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内。

宏观能力研究指体制机构能力的发展，即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政府和国际性组织而言，倾听公众社会的呼声是一个良策，能促进他们获得正确的政策结果，因为从广泛的公众观点中进行抽样分析会使最终的政策结果更有活力和更可信。代表公众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还有非政府组织（NGO），包括志愿者机构、人道团体、“草根性”民间维权和环保组织、社会慈善活动和类似的公益性组织、个体志愿组织、自我救助团等。这些机构是介于社区和政府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带”，是缓冲政府与基层社区矛盾冲突的减压板块。因此，一个国家的 NGOs 的成长壮大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亦是一个国家公民社会是否强大的关键指标。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社区能力构建中，社区、政府和 NGOs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社区是能力领域的起源，是发起者、倡导者、也是受益者，能力的表现于识别社区内在的价值和可利用的各类有形和无形的资产；NGOs 是推动者、协调者和顾问，介绍计划模型、提供信息共享、搜寻资金来源；政府不是施舍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是合作伙伴、是共同承担风险的股东之一、更是促进者。因此，在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社区协同力非常重要。协同意味着社区不能独立行动，需要和相关的社会部门一起行动。许多的案例研究显示，在反贫穷战略、NGOs 与政府合作、赋权和共享发展、积极的能力构建等情况下，协同力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在可持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参与工作，如初评、计划、发起、训练、实施、监控和评价等阶段。

2 . 发展取向：从权利为基础的研究（RBAs）到责任为基础的研究（OBAs）

推行自下而上社区发展模式

发展学研究从主要为自上而下的研究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研究，从把贫穷社区看成“白人的负担”或“政府的负担”到让人们参与他们自己社区能力的发展。研究中心是社区资产而非社区的不足，关键需要社区的参与和公众的行动。参与性的研究在许多文章出现，如 Gujja 等（1998）指出当地人有能力为他们自身确定可持续的管理和维护的常规做法。Shah and Bourarach（1995）认为妇女问题和优先权不仅在于与男性不同，还在于妇女依赖基础服务和设施和它们的社会背景。

这里通过 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案例进一步说明。获奖者是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雷美银行，因为他创造了自下而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小额贷款找到一条走出贫困的途径。这是一个开拓性工作，他们将传统的银行借贷方式颠倒过来，不是去问“穷人是否有信用度”，穷人总是如期还债，而是问“银行家们是否有人民的信赖度”。“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潜力和权利去过一种正直的生

活。穿越不同文化和文明，尤纳斯和格雷美银行已经向我们展示出，即使是穷人中那些更穷的人也能通过工作得到自身的发展”。格雷美银行现在一年贷款近 8 亿美元，平均额度为 130 美元，借款人 97% 为妇女，贷款偿还率为 99%。多数贷款用于奶牛养殖和开杂货店。因此，这种微观金融的重要性在于：把穷人的网络和文化转变为经济价值，融入市场；赋予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权利；在“人的规划”基础上实施发展。这个案例有力地支持了发展学的自下而上的研究。

从社区心理学 (Community Psychology) 角度研究个体和社区、社会的关系

传统心理学仅仅研究个体的认知、情感、动机、行为、心理发展和相关过程。但是在国际发展学研究中，心理学从仅仅关注个体转变为考虑个体、社区和社会是如何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从而推动了社区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它超越了传统心理学的框架，研究个体和社区、社会的关系，从多种层次而非单一的个体层次上来说明问题，它把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寻求理解和推动个人、社区、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

社区心理学包括两级改变：第一级和第二级改变。第一级变化不改变规则、制度和人员关系，只是重新替代团队或社区的成员，这不是长远之计。第二级变化则改变社区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改变共享的目标、制度和权力关系，如把学校改变成为所有学生提供有效学习的场所，为年轻母亲赋权等。社区心理学研究强调生态水平的分析：个体融于家庭、友谊网络、教室和小团队的微观系统中，微观系统融于学校、办公室等组织中，组织融于更大的地区中，地区融于社会和文化的宏观系统中。微观系统与个体最接近，宏观系统最远，但不论远近是都影响个人生活。

社区心理学中价值观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阐明问题和选择；促进对社会问题主要观点的质疑，确定行动和价值是否匹配；了解文化，理解社区对不同价值的理解。社区心理学建立在七个核心价值基础上：个人和家庭的身心健康、社区感、尊重人的多元化、社会公平、公民参与、合作和社区力量和经验基础，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其中，社会公平包括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前者考虑社会资源是否公平地分配，后者考虑决策程序是否广泛。这七个价值息息相关，追求某一个价值而不考虑其他价值，会导致片面地研究和行动。

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结构型变化，中国呼唤和谐社会和社区，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寻求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发展学研究中，除了要推行多维研究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推动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合作研究以外，特别要强调社区能力构建的研究，因为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最终目标之一。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借鉴西方新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和社区发展的研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

美国 CASB Ventures LLC 董事长,美国东方银行董事李大西

1. 引进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的关键

中国正处于与 19 世纪末美国类似的地位。但要达到当年美国超越英国的类似情景，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最缺乏的还是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激情。当年美国涌现像爱迪生、怀特兄弟等一批发明创造的英雄，正是由于当年美国社会雄心勃勃，敢于创新的风气。目前世界科技的发展与 19,20 世纪相交时期十分类似，科技在呼唤着大突破。绿色能源产业是中国未来的关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的关键。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可能带来全新的突破的新技术，例如高空风能发电新技术。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些新技术的诞生地和成长地。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包容、解放、产生激情的地方，就有可能把希望变成事实。这次日本大地震的核电灾难，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到世界迫切需要新的干净能源技术，迫切需要新的突破。为此，我们需要在中国倡导科研发明的宽松生动的氛围，鼓励帮助有创新思想和有能力的人到中国来，长期也好，短期也好，华裔也好，洋人也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全力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创造性，带动一班人，做出突破。

千人计划使我协会会员十分振奋，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直接抓海外人才问题，显示了一个战略性的飞跃，影响十分深远。我们积极响应，组织了 3 个千人计划代表团访问中国。很感谢中央组织部和各地有关部门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组织的几个千人计划重点项目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例如有可能使我国新能源产业产生重大突破的张建军博士团队的中高空风能发电技术，已经在广东落地，做出了样机，在全球的竞争中，站在最前列。我觉得千人计划的选才应着重挑选有可能在重要的科学，技术中可能有重大突破，对中国的发展有重大推动的项目和人才。当然，实际做起来很难。有革命性的创新要得到国内一般评审专家的好评很不容易。我认为，在选创新人才方面，要有与挑选领导干部不同的做法和想法。选领导人，要求万无一失，必须非常小心，非常谨慎。而选创新人才，必须要有风险投资家的意识，要有冒险精神，要允许失败。挑 100 个创新人才，有 20 个人才有重要成果，那就了不得。

2. 高空风能发电新技术是中国绿色能源革命的关键

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如何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成为核心，利用高空风力发电已经成为多国关注的重点技术。环境和气候科学家克里斯蒂娜·阿彻 (Cristina Archer) 和肯·卡尔代拉 (Ken Caldeira) 的研究报告指出：高空中蕴藏的风能超过人类社会总需能源的一百多倍。但是，多年来高空风能发电主要面临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材料问题，主要是高空风能收集、风能转换为机械能等所需要的轻质高强度材料难以获得；二是控制技术问题，主要是高空风能发电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亦即空中部分的稳定性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近几年来，随着各种耐磨、耐化学腐蚀、抗紫外辐射的轻质高强度材料的不断涌

现，目前高空风能发电所需的材料已经可以从市场获得。同时，全球能源问题和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世界主要国家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日渐迫切。这些都大大刺激了高空风能发电在欧美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在高空风能发电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商业化运作快速发展，但高空风能发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目前还未形成。高空风能量总是存在的，只要能把这些能量转换成电能，就可以有效解决日趋严重的能源问题和污染问题。只要开发出高空风能发电的技术，就完全可以实现大规模清洁能源的开发，以此应对地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天风技术是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的高空风能发电技术，居国际领先地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新能源产业是我国加快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风能（发电）则是新能源发展要突出的可再生能源。天风技术的产业化，有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抢先占领高空风能发电领域这一世界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促成中国风电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宏伟目标。

能源行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碳排放第一大户，电力行业则是我国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大户。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火电装机（以燃煤机组为主）占总装机容量 8.74 亿千瓦的 74.6%，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量中火电的所占比例超过 83%。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计，到 2030 年，全球电力需求年均增速为 2.5%，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达到 48 亿千瓦，其中 28% 来自中国，而煤炭仍然是发电行业的最主要燃料，到 2030 年的比重将增长至 44%。

根据专家统计估算，每输出 1 度风电，可以节约 0.4 千克标准煤（《2009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为 342 克/千瓦时），同时减少污染排放 0.272 千克碳粉尘、0.997 千克二氧化碳、0.03 千克二氧化硫和 0.015 千克氮氧化物。根据上述数据，以应用天风技术建设的 100 兆瓦高空风力发电场项目（年发电量约 5.6 亿千瓦时）为例，我们可估算出，仅此项目，正常投产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原煤逾 30 万吨，减少污染物排放逾 70 万吨。因此，天风技术可为我国减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可靠的技术条件和实现途径，可在实现我国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宏伟目标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低碳中国的战略选择

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国际低碳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玮生

要承认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对于全球气候是否在变暖的争论，虽然有科学家称全球气候变暖是 20 世纪最大的谎言，也有人说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全球气候正处于一个日益暖化的时期。

对于原因的争论，也导致了面对气候变暖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放任态度，认为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无能为力，也必将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一种是遏制态度，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因此人类要采取行动，减少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的进程；而第三种态度则是上述两种态度的综合，认为气候变化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人类不可能完全改变气候上升的趋势，但也不能消极等待，而需有所动作。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赞同二氧化碳说，认为气候变暖是人为造成的。但科学不是多数决定论，真理也许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京都议定书》采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策略，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不确定性，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实际效用的减排国际公约。

要坚持走阶段性减排的道路

国际减排谈判，有一种游戏性质，减排需要理由，减多少也需要一个理由。在这类谈判中，国家实力是话语权的保证。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一条阶段性减排的道路。

中国的阶段性减排道路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全自发性减排阶段。中国在《京都议定书》第一约束时间，也就是2012年前的减排工作，就属于自发性减排；第二个阶段则是自主性减排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这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是一个自主减排目标；第三个阶段就是强制性减排阶段。中国最终会走上强制性减排道路，但不是现在，更不会是和美国在同一个起点。当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高于世界人均许可排放量时，才应该接受强制性的减排责任。据计算，这个时间起点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

中国的阶段性减排路径只是根据现阶段的排放额度确定的一种模式，没有考虑碳排放历史累积量的问题。如考虑历史累积量，中国的强制性减排阶段的起点时间还要延后。但由于发达国家对于历史责任的认定问题，使发展中国家追求历史性公平变得异常艰难，而在只考虑现实公平性的情况下，这种阶段性减排路径安排，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且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要首先坚持做无后悔行为

从科学角度分析，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三种行为方式：

第一种方式称为无后悔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关系，即使将来的气温并不会上升，我们也依然要采取的行动，便是无后悔行为。这类行为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等。无后悔行为是人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策略。

第二种方式称为最小后悔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活动。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新能源的开发成本较高，其开发利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为了优化能源结构，保证能源供应的永续性，即使没有气候变暖问题，依然要开展这类行动，甚至在有风险的情况下也要进行，这就是最小后悔行为。

第三种方式称之为特化行为。主要是指将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封存，

这是专门为对付气候变化而想出的办法。封存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是解一时之困的主意，没有任何好处，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成熟的技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子孙后代和全人类，就要坚持做好无后悔行为和最小后悔行为，以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

从中日比较看中国节能的潜力--中日“技术差距”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有较大的节能潜力。但是在进行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原单位）国际比较时，使用名目兑换率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PPP）计算的兑换率其 GDP 值将有较大变动，能源消耗原单位也会有大不相同。因此节能的潜力也会产生较大差距。

事实上，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开发报告》中都发表有以美国的物价水准为基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各国的 GDP。例如，2002 年版中，200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按名目兑换率换算为 840 美元，按 PPP 换算则为其 4.7 倍即 3940 美元。其计算并非按照市场汇率 1 美元 = 8.28 元，而是将人民币的价值提高了 4.7 倍即 1 美元 = 1.76 元。与此相对，日本按照名目兑换率计算为 34210 美元，PPP 换算后却为 26460 美元。中日之间的差距用名目兑换率换算为 40.7 倍，用 PPP 换算将缩小至 6.7 倍。

没有一种能源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目前没有一种单一能源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化石燃料终有枯竭的一天，开发新能源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但仅靠一种能源是无法支撑这个社会发展的。因此，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需要综合考虑，要照顾到各类新能源的优缺点，盲目地求新求变既不切合实际又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是不可取的。只有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形成多种能源的互补性组合，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社会发展的能源体系。

而低碳经济，和前一阶段风行的循环经济一样，都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低碳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现在仅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走低碳道路绝对是一种无后悔行为，目前起步还不晚，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低碳中国建设与创新战略的几个思路

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低必要条件

低碳社会，即是为了防止人为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将 CO₂ 的排出量控制在自然平衡能力之下，以达成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浓度稳定的社会。为了实现此目的，要求各个国家、地区及全球共同致力减排与扩大 CO₂ 吸收源事业。

低碳战略新思维

- “全球中的中国”思路：在全地球系统中谋求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 “跳跃式发展”思路：后发者利益的最大利用。
- “WIN-WIN”思路：FROM ZERO-SUM GAME TO WIN-WIN GAME。
- 统合战略思路：酸性化与温暖化，区域性与全球性，短期与长期。
- “百年发展战略”思路：在 5 年计划与 10 年计划基础上，考虑百年发展计划。建议设立“中国百年发展研究院”。
- “五千年与百年”思路：中国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不怕慢、就怕弯。认识积累对

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

- “中华经济圈”与“中华人才圈”思路。
- “脱碳战略”与“开源节流”思路：构筑能源自给战略与低碳社会战略。
- “文明转换”思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组合。
-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与“道法自然”思路。

建设“东亚低碳共同体”

实现低碳社会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目标。但是在节能高效技术方面日本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此之上的CO₂削减需花费大量成本，并且也不可能再达到很大的程度的削减。另一方面，中国作为CO₂的排出大国，虽具有巨大的削减潜力，但仅靠国内的努力有较大的局限性。另外，若经济增长、公害与低碳化之间的相乘效果被认知后，将对实施低碳政策具有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因此，基于创新技术的开发、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变革等的政策革新，创建超越国境的广域低碳社会（低碳共同体）将成为重大课题。

实现低碳社会，并非单纯是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忽视人类的生活质量的举动，而是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同时，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和谐，创建可持续发展并具有活力的社会。换言之，实现低碳社会可谓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即不仅达到了削减CO₂，同时也做到了改善能源结构、导入环保可再生能源、做到能源的安全保障、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解决酸雨等公害问题、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抑制人口增长、大幅度增加植被面积等多方面的附加效果。是即使没有全球变暖问题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形态。例如：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内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并非相悖课题，酸雨问题与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因此，通过实现低碳社会可同时解决上述两大课题。温室效应气体具有长期影响力，中国若不实施适宜有效的对策将会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因此需要一个能够同时解决中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公害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最佳对策。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中国之路

法国拉法基水泥公司工业管理及投资总监林平

低碳经济到底是什么涵义呢？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内涵很广，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各个领域。低碳经济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提高能源效率，一个是采用低碳能源或者是零碳能源，还有一个是去碳技术，这样能够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少。它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是遏制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建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并由此可

以导致经济及其管理体制上的重大革新和社会进步。

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能源消耗量也在迅速增加，根据 EIA（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综合分析及预测办公室）2007 年发表的 Energy Outlook 2007（2007 能源形势）预计中国到 2030 年一次能源消费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3.5%，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目前能源产量居世界第二，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一次能源的储量低于世界平均值。能源供应形势不容乐观。

降低能源消耗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替代能源，也就是使用具有燃烧值的工业废物和城市垃圾。众所周知，工业废物和城市垃圾的处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环境和民生的重要问题。他们两者的有效结合即将成为中国循环经济的良好开端。笔者熟悉的水泥行业恰恰是这两者有效结合的有效载体。

水泥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九五”和“十五”的发展，水泥产业已成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产业，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国仍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都将继续拉动水泥产业的快速发展，水泥产业仍然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水泥产业是以矿产资源为基本原料，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以高温窑炉这种高耗能、高排放作业方式为主体的产业。但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我国水泥工业发展以新型干法生产技术为主导。由于新型干法生产技术迅速发展，节能减排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反映出科技进步对建材工业节能降耗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水泥产业的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仍居于前列。据统计，2009 年我国原煤产量为 29.6 亿吨，燃烧所排放的 CO₂ 为 77.5 亿吨，其中水泥生产能耗约 1.8 亿吨煤，占当年全国总能耗消耗 6.6%，CO₂ 排放总量约 13.8 亿吨(包括生产水泥用碳酸钙分解排放的 CO₂)，占当年全国 CO₂ 总排放量的 26.1%。

利用水泥窑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等废弃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水泥窑由于其本身的工艺特点，适当加以改进后，在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等方面，比现有的垃圾焚烧炉更具优势。水泥窑全封闭、生态化处置生活垃圾技术可以解决垃圾发电产生二噁英污染的难题。利用水泥窑处理废弃物不但可以节约土地资源，还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被认为是处理废弃物的最佳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 660 个城市每年产生垃圾量已达 1.5 亿吨，而且正以 5%左右的年增长率增长，许多大中型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均已填满或即将填满，难以为继，垃圾围城的形势十分严峻。利用水泥窑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等废弃物存在特有的优势，这种处理废弃物的方法不但可以使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处置，减轻城市的环境压力。同时，还可以为水泥企业节约原料燃料，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已成为水泥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多家水泥企业已经在利用水泥回转窑焚烧垃圾和污泥生产熟料项目上有成

功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泥工业利用水泥窑处置废弃物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关于水泥窑处置利用废弃物的技术、装备还不成熟，很多技术装备还在研究阶段。但与技术相比，笔者认为发展水泥窑处置废弃物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配套齐全。我国装备研发设计水平并不落后于国际先进国家，但在政策方面，国家鼓励水泥企业利用废弃物的政策并不配套。推广水泥窑处置废弃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相关政府部门的配合。水泥窑处置废弃物的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但是水泥生产线配套废弃物处置设备，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就涉及到补贴的问题，可是如何补贴？谁来补贴？并无规定。同时，水泥窑处置城市垃圾，就涉及到对垃圾的分类处置，但目前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不够，垃圾的处置工作因此也将受到阻碍。

经历了 20 多年的生产实践，发达国家水泥工业协同焚烧处置废弃物的各种配套法规已经基本完善，各国政府和广大公众已经达成了高度共识，认为这条技术路线环境安全、经济合理、技术可靠。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大力研究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的环境安全问题的 15 年间，此项技术路线也开始传到南美和亚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瑞士豪西姆水泥公司和德国国际合作公司在 2005 年 3 月共同发布了《水泥生产过程协同处理废物指南(最后草案)》，对目的、定义、界限、法规、社会责任、环境安全、技术标准、员工培训、市场调查、废料性能研究、提出烧废料申请、审批程序、建立废物管理制度、污染物排放记录等均有阐述，并附有国际重要文件和规范标准等 18 件。对我国当前情况颇具参考价值。

我国推广水泥工业协同处置废弃物，目前要确定可用废弃物的种类及质量标准、各种有害成分的含量极限；制定水泥窑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法规、确定申请与审批程序；建立相关的监管、激励、惩罚机制；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等。

我国水泥工业对国外的技术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盲目削减环保投资；要防止监管缺失造成污染扰民。水泥工业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对社会负责的科学态度，稳健地推广、改进、创新协同焚烧废弃物的技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环境安全。

从截至目前的大量实践及其效果来看，水泥窑协同焚烧社会废弃物，在遵循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充分保障环境安全。

发达国家水泥生产主要以石油焦(Petcoke)为主。其燃烧值高于煤。近年来随着石油和煤价的大幅上升，许多企业开始使用替代能源。20 世纪七八年代主要是用汽车工业的废料，如用过的废机油和废轮胎；九十年代起受疯牛病影响开始在水泥企业消灭大量不洁动物饲料；21 世纪水泥企业开始对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产生浓厚的兴趣。2009 年有的水泥企业能源替代率已高达 75%，峰值高达 100%。替代能源为这些企业节约了大量成本。

替代能源的使用也带来了不少技术难题，要保证水泥的质量不能降低，生产过程必须稳定，并且燃烧过程必须环保。水泥窑的现行工艺是窑头窑尾两处加燃料，燃料分布必须根据燃料物理特性和燃烧值来确定。此外，固体垃圾的预处理也是保证生产

过程稳定的关键。这里说的预处理主要是为了垃圾的分拣和粉碎，然后送进水泥窑。这一整套替代能源技术就是水泥企业目前的技术革新战略。

欧洲这一整套替代能源技术的项目费用约为 600 万欧元，年固体垃圾处理量为 5 万吨，以固体垃圾的燃烧值是煤的五分之一来算，就是 10000 吨煤，节约 120 万欧元。如果这套设备在中国制造，项目费用就低的多，然而国内煤价却接近 800 元/吨。值得一提的是替代能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工业和生活垃圾的收集，在欧洲这个问题已初步解决，产业链已成规模。政府也早就出台了出垃圾者出钱的原则。目前国内的政策是排污企业必须具备污染物处理能力，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污染物处理是很专业的。普通企业的责任应该是储存污染物保证不污染生态，然后出钱由专业的公司进行污染物收集，处理，最后消灭。我认为在中国只有建立这样完整的环保体系，我们才能变废为宝，降低能耗，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所以说 21 世纪水泥行业和废弃物处理完整结合的环保体系是当代中国低碳经济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循环经济的良好开端。具有海外实际经验的人才在这儿肯定大有作为。

有关更好吸引海外人才的建言献策

美国系统分析公司创始人和现任总裁 张晓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现阶段，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岌岌可危，而中国经济仍以年 GDP 高于 9% 的速度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稳定要素。全球性的经济萎缩给中国企业及海内外留学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沿海民企已到了提升科技含量，产品升级的最佳时机，同时也是留学生们施展高科技研究开发才华，报效祖国的最佳时机。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波士顿地区华人科技企业协会总共接待了近 50 次国内访问波士顿的代表团，也组织了多次团队访问国内几个省市。通过与政府、国企、民企的广泛接触，笔者深深体会到海归人才为国创新创业应该与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紧相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需要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培育新型战略型产业来逐渐替换旧有产业，更需要与现有国企、民企合作，引进人才、项目，改良现有企业，同时得到地方政府、国企、民企的扶持。另外，吸引海外人才为国服务，也应与“走出去”战略紧紧相连，吸引海外人才不仅仅是让他们归国创新创业，也需要他们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调整好心态，充分做好长期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关键之一在于与民企找到共同的合作切入点，以期顺利地到有需求并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域入户创业和扎根发展。海归企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政府提供的项目启动扶持资金用完前，有效地利用好民间资源，包括招聘企业本地人才，后续资金跟进，和发展市场定位与开拓能力。

为更好地把握这个时机，协调政府、国内企业和投资单位，做好留学人员及海归企业的归国就业创业工作，我们协会提出以下建议，既关乎如何有效地吸引利用海外人才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型战略型产业，也关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面临的国际竞争能力差，管理人才匮乏，信息不够畅通的问题。这些建议也适合其他民企实力比较雄厚的省市，供各方面专家，决策人员参考。

建议 A：在政府的招才引智的计划中，适当增加民企参与度和增加民生问题的比重

国内的许多城市都有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工作人员归国科技创业的人才计划，它们在提供创业先期天使资金，满足各地发展需求上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鉴于浙江民企相对发达，产业需求突出，民间资本比较雄厚，建议在计划的项目需求中，适当包括一些民企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有产业化前景的具体科技项目，寻求海外人才的技术解决方案。具体操作可参考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Small Business Innovative Research, SBIR）的有关做法，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健康总署、能源部和国防部等部门每年为美国科技小企业准备的数千个具体科技项目。这样，一方面将有效地帮助海归在准备课题、筹划项目时集中精力、有的放矢，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民企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这些计划也可考虑吸引一些民企投入一部分资金和参与项目的评审工作。项目的范围也可考虑扩展到一些如医疗、健康、教育、食品药品检测等民生课题，发展一些能结合本地的综合发展优势有特色有基础的产业。

建议 B：为民企与海外科技人才牵线搭桥

据我们考察，相当多的民企处于产业转型企业升级的关键期，急需对口的科技专才和海外营销人员。虽然有较好的资金储备，但缺乏找到合适人才的途径。另外，相当多的海外留学人员懂技术，了解海外市场，但不便马上辞职归国创业和工作。我们建议与政府一起，为民企找到海外科技顾问，民企可通过海外顾问，了解国外科技发展动向和市场走向，为一些具体技术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并为将来民企走向国外做些准备；另一方面，海外人员也可通过民企了解国内该行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和市场需求，这样的顾问工作也有助于海外人员自身的职业发展，更细致的有方向性的了解中国，为其将来归国创业工作打下基础。这样的对接是有紧迫需求的，是互利互惠的，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建议 C：建立种子子公司

大部分海外人员由于诸多原因，不能马上归国创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内无法立即找到合作伙伴，因此对市场的需求了解不够，对项目的融资能力缺乏信心，以致对创业风险无法准确估计。尽管有相当多的海外高科技人才怀有一个回国创业的梦，并且几乎每年都来国内谈项目，但无果而终的案例不在少数。我们建议是否可以这样考虑：譬如，由海外人员提供技术和少量资金（3000 元美金/人），由国内信誉度较高的机构或企业出资 7000 元美金，组建科技种子子公司，股份协商分配。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主要依靠国内人员，种子子公司尽快找到投资或合作伙伴，了解掌握市场需求，制订营销策略，完成并提交高质量的项目计划书。这样的做法如能实施，海外人才可以在先期无须辞职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与国内种子子公司一起，低风险地完

成早期的过渡准备工作，为最终的回国落户创业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建议 D:建立科创基金

目前，国内各地尚缺良好的风投资金的跟进机制，这是海外人才在撰写项目计划书时最有顾虑和最具不确定性的难点之一。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基金往往偏爱投资于中后期项目，尤其是即将上市的企业，民企对科技小公司的前沿技术是不了解，对科技企业的发展轨迹也缺乏认识，因而缺乏信心和耐心，看的多，投的少。这样导致了民营资本的疏散投资甚至不合理投资，例如更倾向于投资他们比较熟悉的房地产、股票市场和食品纪念品哄抬等短期行业，限制了民营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的有机结合。而政府主导的风投，更因为决策人要涉及和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资金投入强度比较弱，审批周期较长。如何吸引民间资源的介入是扶持科技小公司茁壮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关键。

我们建议成立这样的科创基金：由政府出少量引导资金，几百万到一千万不等；海外人员负责募集海内外匹配资金；邀请国内民企投资加入或跟投，由具有成功科技创业经验，有广泛项目来源及评估人力资源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希望这样的以三合一方式融集来的基金能让政府、民企和归国创业人士信任。政府引导资金可以在数年后退出，基金投资的方式可多样化。这种资金可用于对初创型公司的风投，也可用于投资中后期公司。一旦基金和民企的投资利益捆绑在一起，投资项目数量、力度和效益有望明显提高。

建议 E：发扬抱团发展理念，筹建园中园

浙江的企业发展特色鲜明，特别得益于抱团发展的模式。浙江企业从产品类型分，包括皮革类的、童装类的、家电类的、钢铁类的；外企也有日企的，台企的，还有硅谷海归的。按照各地产业转型指导规划中的领域，选择核心领域重点发展，这对产业转型是很有帮助的。单枪匹马地攻克难关，创业成功的几率已变得越来越小，大部分企业应采用团队作战，集体攻关。如果能将互相了解和信赖的，有能力和领先技术，且已经在美国创业或将要归国创业的朋友和创业同行组织在一起，分期分批陆续回国或共同归国创业，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顾虑，而且在信息沟通方面也会更加快捷、准确、可靠。另外，如能将建议 B, C, D, E 一起采纳，其成效可能会更加显著。

譬如说在开发区内设立一个波士顿或硅谷科技创业园，增加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努力形成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先期可设立办公室以举办海内外交流、项目对接等活动，先期种子基金可来源于建议 C 和建议 D 或其他方式。项目的筛选和评审可由园区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海归人员，组织在专业技术领域有较深造诣的相关海内外专家和有科技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来实施，入园项目及引进的人才由园区领导和专家委员会最后共同决定。入园前项目再行公示。由于相当数量的海外专业协会在国外已有广泛的高科技企业和专业人士会员基础，他们掌握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具有国内外科创企业运营的亲身经验，由这些专家组成的专业技术委员会来做技术和市场评判有较高的准确性和认可性。这些协会对申请人在海外的个人经历和前沿技术水平也会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用多种灵活方式，园区可以把国际高层次人才快速引

进，让国际领先技术在国内快速开花结果。被推荐的企业入驻园区对后续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会有很大的示范和鼓励效应，这样的园区也将成为联系开发区和海外协会会员的有效桥梁。由于有广泛的人才项目储备和种子资金的不断推动，这样的海归园区模式也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兼论 如何利用海外职业服务资源

安永（美国）大美洲税务部中国海外投资主管合伙人张晓青

收购世界领先的传统制造业公司 - 成功并购，优化整合，消化引进

美国 A 公司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全球领先的某传统制造企业。在收购之前，我国 B 公司是美国 A 公司在中国子公司的股东，并且在多年的合作中对美国 A 公司的业务、技术和产品非常熟悉。虽然该传统制造业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情况不好，但在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很高。我国 B 公司在制定收购战略时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并对美国 A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前景作了深入的分析，希望双方在并购后以技术和市场资源进行互补。我国 B 公司与美国 A 公司的并购接触。自 2007 年开始，因价格分歧而一度中断。2008 年金融危机中，该传统制造业前景低迷，私募基金股东有意退出在美国 A 公司的投资。同时，美国 A 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大笔债务即将到期，不得不再次联系我国 B 公司。我国 B 公司抓住这一契机，在 2009 年开始对美国 A 公司国际公司进行收购，有计划地从参股到成为控股股东。我国 B 公司除了注资帮助美国 A 公司偿还债务，而且承诺了并购后不裁撤美国 A 公司员工。这样既缓解了美国 A 公司的债务危机，又得到了员工、当地公众和政府的支持。2010 年 6 月我国 B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约十数亿美元的总价格完成了对美国 A 公司所有剩余股权的收购。本次收购是一起立足于技术的软资产收购，是中国国有企业开始掌握世界级技术性产业的一次尝试。同时，从合作、参股再到全部控股，其逐步渗透的收购策略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一个范例。

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将满足我国 B 公司发展战略的世界领先的美国 A 公司有条不紊地收归麾下还仅仅是此次收购成功的第一个亮点。我国 B 公司此次收购的第二个亮点是在美国世界一流的会计事务所的全力协助下，对于美国 A 公司成功实施收购后整合。

收购美国 A 公司后我国 B 公司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彻底了解并购后美国 A 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和总部衔接。这个过程中突出了两个海外并购后中方经常面临的挑战。一是对于国外财务管理复杂的技术制度和细节了解不够，接管后中方感到千头万绪，但又不确定首先从何处下手解决。将这个技术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中方人员落地后即刻面临在当地语言、人情、工作文化和风格等软实力方面的对接和适应的挑战。这两方面恰好是美国会计事务所的强项。美国会计事务所派出了由拥有美国十几年财务税务工作经

验，通晓中英文和中美文化的合伙人为领队，美国和华裔会计专业人员为成员的双语双文化的整合协调团队，在接管后第一时间进驻美国 A 公司，从财务操作细节和当地文化两方面与中方企业发展理念的引导和坚定性形成有力互补，互相支持，联手成为推动企业财务和运作整合的主导力量，冲破了部分潜意识中寄托美国公司操作的特殊性和远离公司总部的地理条件而对整合持疑问态度的美国 A 公司高管的惰性。美国 A 公司管理高层曾经对于我国 B 公司和美国会计事务所团队的紧密和融洽的合作而惊叹，因为事先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国 B 公司在美国也会这样彻底成功。在中美双方整合团队不到一年的共同努力下，彻底理顺美国 A 公司财务税务，完成和总部的财务整合。

最后特别指出的，也是此次收购的第三个亮点，是我国 B 公司理智和战略性地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 A 公司变成中国公司从技术、设备，到商业运作、企业管理、财务制度和监督等各个方面全面引进国际先进理念的平台。我国 B 公司长期在美国 A 公司派驻一名业务副总裁和一名财务副总裁，从日常每一天，每一个决定中探索、体会国际一流公司的运作和经验。我国 B 公司集团的领导经常亲自来美视察，和美国 A 公司的管理层沟通交流。同时，B 公司总部不断从中国派各部门人员来美国 A 公司学习考察，从厂房设计到财务审计，要求把美国企业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彻底学透，把好的经验最快移植回中国。这种广泛、深入和认真的学习堪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运营整合的典范。现在美国 A 公司在中方支持和积极参与下运作良好，市场竞争显著增强，初步实现了当初技术市场资源互补的战略企图，也为将来更多、更大范围的海外扩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纽约地产--海内外并购团队合作的典范

这是我国一家大型中国民营企业 E 在纽约黄金地段成功收购房地产的案例。这家民企已经在美洲以外的国家进行了多次并购，对海外的并购流程很熟悉，而且在国内拥有一流的并购专业团队，境外还有常驻的代理。该企业虽然制定了在美国的长期地产收购计划，但是缺少在美国市场商业资源融资和人际的平台，也没有在并购的设计阶段对并购后的目标地产的经营和管理做出筹划，企业自己的地产管理公司没有管理海外地产的经验，因此在成本上和经营能力上都不适合。在这样多种异域操作的不利情况下，E 企业成功突破美国地产市场，并且谱写了中国企业和海外职业团队强强携手，戮力同心赢取佳绩的杰出范例。这次并购的成功经验最重要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 企业最高管理层前瞻性地制定了全球发展战略，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将大规模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资源作为推动企业未来向国际公司列强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果断地在金融风暴后即刻进军美国地产市场，这是 E 企业领导层积极前倾的跨国运作理念的自然归属，也从宏观上掌握了美国商业房市危机待苏的良好时机。

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了的人。这次所并购的纽约地产，戏剧性的缘起是 E 公司的管理人员在进行另类目标的考察时偶然询问而引起。恰逢业主在地产竣工后急于抽回资金它用，双方一触即和，对话迅速地向实质性发展。这个表面机遇的偶然，反映着 E 企业时刻准备着的必然。E 企业董事局全部董事都会英语，在最高层就实现了人才国际化。其国际投资部的成员常年保持主管国家的签证，可以在第一时间飞赴交易所在

地。仅从此两点，就可见 E 企业对于海外发展的重视和准备的充足。

E 企业有一支极其敬业、勤恳、乐于拼搏的高素质专业并购团队。并购是期限性极强的高度紧张的体力和脑力支出活动，而在海外的并购尤其如此。白天要和收购对象、会计、律师、中介等反复谈判，阅读资料和报告，熟悉当地人文环境，协调处理预定和突发的事务；晚上要及时总结白天的进展，和总部沟通，并将总部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海外职业团队，准备第二天的谈判和阅读更多的报告。

E 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自始至终表现出非凡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首先体现在他们主动多方地学习海外企业和并购过程的知识，不论是从所雇用的海外职业团队，还是谈判对手，不论是和自己预期相同，还是和自己想象不同，E 企业的并购团队都能采纳进专家意见，最大化地利用了海外职业团队的技术特长和文化特长，使得整个并购团队始终保持协调一致和最高水平的发挥，使得谈判始终在一个互相尊重，优化协商的和谐氛围中进行。E 企业难能可贵的包容性还在于它利益分享的理念。从和职业团队的费用协调上，以及和目标地产的交易利润的分享上，E 企业从不单一地仅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积极探索、接受共赢互惠的途径和结果，充分赢得了职业服务团队甚至谈判对手的尊敬和信任。

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外职业资源，直接在美国雇用世界一流的会计事务所和法律事务所，加强财务、法律专业力度，弥补境外收购中的海外商务规则、资源、情报、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对称，使得远隔重洋的并购就像在国内进行似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地得以圆满完成。

E 企业在美国当地，委托世界一流的会计事务所承担了 财务、税务、市场的尽职调查以及并购后公司税务结构规划的服务，并且积极主动地吸收该事务所参与各类与卖方的接触和谈判，并将其作为整个并购过程中的职业服务团队的主力军。该事务所在第一时间内集结起纽约最强有力的地产交易支持团队，团队从上至下经验丰富。第一次和卖方正式接触，专业上就超出谈判对手，一个极具创意的省税建议就将卖方的税收降低数千万美元，从而在保证卖方利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售价，促使价格谈判一开始就进展顺利，价格很快确定。

雇用当地世界一流的职业团队，还可以充分利用其多年经营的雄厚客户关系网和多元的协同能力，弥补了海外并购资源、情报和经验上的不足。此次收购 E 企业借助了美国世界一流财务职业服务公司的力量和平台，利用会计事务所提供的世界级商业银行融资渠道和免费的竞标评估帮助，扩大选择和竞争力度，成功的从美国银行获得了相当于并购资产价值近 70%的融资，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资本的使用率和投资回报率，降低了投资成本。在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能够融到如此高额的银行贷款的美国企业也不多见。这不但为企业将来的收购融资奠定了信用基础，提高了作为跨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且这也是中国企业利用海外融资渠道的成功典范。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成功的海外并购既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卓识和努力，也取决于如何最佳利用海外当地的优秀职业服务资源。

本刊通告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论文内容来自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论文集，其中内容有所精简，可能会有疏漏之处，甚或影响原意，敬请包涵与谅解。

简 讯

由（美国）中国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华夏时报社联合共同主办的“**2011华盛顿中美投资论坛**”即将于2011年10月5日-6日在美国国会山隆重举行。此次论坛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全面了解美国的投资环境，促进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增进中美之间经贸合作，实现中美经济双赢发展。

由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美国纽约市大学亚洲亚裔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创新与合作峰会**将于2011年10月30-31日在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马奎斯万豪大酒店召开，会议将围绕“加强中美两国在创新方面，特别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展开。